

文章编号:1003-6121(2018)03-0122-07

隐喻研究的跨文化视角

吴越民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隐喻思维是人类共有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特点。由于地域的、历史传统的以及各自文化形态的差异,人类才有了不同民族和社会的具体存在。隐喻思维在不同的民族中也包含着不同的文化内涵,生活环境、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直接影响着喻体的选择和使用。在西方隐喻理论中,隐喻首先是一种哲学行为,其次才是语言行为和诗学行为。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易经》所透露出来的“天人合一”是隐喻思维的文化根基。通过对隐喻这一特殊的语言认知特点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能够比较全面地发现隐喻的建构机制和使用特点及其深层文化内涵。

[关键词] 隐喻思维;隐喻研究;跨文化视角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长期以来,隐喻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基本的修辞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从认知的角度研究隐喻。隐喻认知观认为人类常常运用隐喻式的思维方式去认识世界,因而人类语言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隐喻的烙印,隐喻性语言是人们在头脑中把不同的事物或观念进行跨域联想的结果。一般说来,隐喻由“本体”(tenor)和“喻体”(vehicle)组成,本体和喻体原本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但人们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发现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于是把已知的概念用到未知的概念上,用具体的、个别的事物来解释抽象的、一般的情况,从而形成隐喻,隐喻是以喻体和本体之间的相似性为基础的意义转移。通过喻体和本体的相似性表达本体难以表达的含义,从而生成新的意义。^{[1]178}隐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越来越引起广大语言学家和文化研究者的关注,需要我们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来破译其秘密。

一、隐喻的建构机制

对隐喻进行分类首先需要考察其生存环境与建构机制。应当看到,隐喻的生存环境是有层级性的。有学者把隐喻分为“语言隐喻”(linguistic metaphor)与“非语言隐喻”(non-linguistic metaphor),而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一个综合系统,人们在生活中发现一种事物的某些特征与另一种不同事物的某些特征相比,具有相似性(resemblance)、像似性(iconicity)或者相关性(relativity),于是就将甲事物某方面的意象(image)转移到乙事物上,从而产生相似性联想或者说隐喻。隐喻认知研究的开拓者、倡导者和理论创始人是20世纪30年代的

[收稿日期] 2018-01-17

[作者简介] 吴越民(1960-),男,浙江海宁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语言与跨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09CGWH007YBB);浙江大学文科教师教学科研发展专项资助

英国修辞学家理查兹(I. A. Richards)。他提出隐喻实质是“互动”(interaction)的观点,将隐喻研究从词语层面,提升到概念层面,成为当代隐喻研究的主要方向,人的思维是隐喻性的,它通过对比来进行,语言中的隐喻由此而来。因此,隐喻的生存环境可分为三个层面:语言、思维和现实。第一个层面的“语言”是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语言”(语音和文字表达);第二个层面包括“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和“隐喻思维”(如认识论意义上的“类比”);最后一个“现实”层面包括实物与行为,如建筑、衣饰、礼节、艺术等等。前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隐喻的“审美”(aesthetic)与“认知”(cognitive)二维。至于第三个层面(实物与行为隐喻)则比较复杂:一方面它们可以被看成是经过特殊方式表达的隐喻话语,如舞蹈语言和戏曲程式等等,其中无疑包含独特的隐喻概念;另一方面,它们有时会涉及审美与认知之外的道德伦理问题,如风俗习惯和礼仪制度等等。隐喻的本体与喻体往往并不对等,二者相差愈远,隐喻内部的“张力”愈大,为此隐喻需要某种“依据”(ground)来维持自身存在。例如,在“阿喀琉斯是一头狮子”这个隐喻中,“阿喀琉斯”是“本体”,而“狮子”则为其“喻体”,它们所共有的特征“勇猛”便充当了这个隐喻的“依据”。^{[2]9}在这样的隐喻表达式中,我们研究的是抽象层次中的“概念隐喻”。阿喀琉斯所属的概念是人,而狮子所属的概念是动物,这是我们的日常概念,即常识,为大家所共有和共享。依照布莱克的替代理论,这个隐喻表达式可还原为“阿喀琉斯像一头狮子一样勇敢”;按照莱考夫和约翰逊的说法,原有的两个概念通过概念隐喻化了,产生了第三个新的概念,即“人被看作动物”。在概念隐喻化过程中,喻源概念的一些特定内涵

在人类经验基础上进行选择,最后映射到目的概念上,形成新的概念——隐喻概念。映射说到底就是筛选,即将概念中所包含的内涵按所表达的含义进行挑选;有的摒弃,有的保留。整个筛选过程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个人素质。

隐喻所指与能指之间关系的建立,一靠相似性,二靠联想,二者缺一不可。前者是基础,是客观条件,后者更多地基于主观,它使隐喻区别于一般类比而富有创造性,一个好的隐喻往往是主客观的完美统一。^{[3]177}隐喻性范畴和命题在各国文化中都占有相当的比重,因为人类从已知到未知的必然之路就是隐喻。我国早期文献中出现的泛指比喻的“譬”“譬”“比”“依”等词语所表述的“喻”就是今天的“比喻”,或西方的“比喻”(trope),或亚里士多德的广义的隐喻。例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在这一例中,就分别出现隐喻的两个成分:本体“君子之德”和“小人之德”,喻体“风”和“草”。由此可见,考察中国古代的隐喻理论,离开比喻是寸步难行的。而且也只有从比喻着手,才能够反映中国比喻理论的特殊发展道路。

汉语“修辞”一词首见于《易传·文言》,所谓“修辞立其诚”。原为立论之意,今指为获得某种效果而采取的话语策略。在这个意义上,它至少与西方的三个术语相当:“rhetoric”、“figure”以及“trope”。在西方传统修辞学中,隐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辞格。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指出:“隐喻无所不在,它存在于我们的语言和思想中。其实,我们人类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4]1}例如在“人生是一场戏”这个隐喻中,“人生”是“主题”(primary subject)而“戏”充当

“副题”(secondary subject);二者均为独立的“涵义系统”(system of implication),如“人生”这个涵义系统中包括诸如“不断流逝的”、“具有不同身份和职责的”等意义项,“戏”这个涵义系统中则包含了诸如“虚幻的”、“按情节表演并有角色分工的”、“需要观众和场地的”等意义项。“主题”(人生)充当隐喻的“框架”(frame),“副题”(戏)则为隐喻提供“聚焦点”(focus);在隐喻中“副题”向“主题”进行投射(project),即“戏”这个涵义系统中的子项意义通过“选择”(如在一定语境下选取“虚幻的”而剔除“需要观众和场地的”)、“压缩”(如将“有情节和有角色分工的”一项并入“具有不同身份和职责的”这一“主题”涵义子项)、“强调”(如突出“虚幻的”这一子项)、“组合”(即形成新的主项涵义系统)的方式而“筛选”(screen)、“过滤”(filter)到“主题”的涵义系统中去,这一互动映射的结果便是“人生是虚幻的、不断流逝的、需要在不同场合扮演不同角色”这一隐喻(新的认识)。再如英语文化中的深层隐喻 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Argument is war. (争论即战争。)He attacked my position on the issue. (他攻击了我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等导致了一系列我们语言使用中的隐喻现象。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严寒之后毅然挺立的松柏的形象只是构成隐喻的一个要素,但在有着悠久的“香草美人”传统的中国文化环境中,它与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坚贞君子形象建立了某种传统惯例的和社会性的联系,生成了隐喻,派生了意义,松柏便成了坚贞人格的隐喻。隐喻在中国文化中不仅是必需的,而其本身就是某种价值观的体现。因此,我们的概念其实并不是反映,而是创造出某些现实中预先存在的“建构机制”,因此人类通过“身体经

验”来建构(概念)世界的认知活动并不是任意的和无规律可循的。^{[5]288}换言之,人类所认识的世界并非先天存在,而是在现实的约束下,依靠人类认识器官通过主客体之间的积极互动而逐渐形成的,即现实制约着认识,认识反过来又改变了现实。

二、隐喻的思维模式

比喻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也是一种隐喻投射。隐喻不仅是语言的,也是思维的,隐喻性语言是隐喻性思维的表现,隐喻概念反映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或认知。在各学科的著作中,大凡越是严格、越是抽象的描述,使用隐喻越多。这充分地说明,人类的语言,乃至思维都离不开隐喻。隐喻化思维是人类固有的一种思维模式,其认知基础是比喻和联想,逻辑基础是类比。中国传统文论以隐喻性的方式展示独特的内在感悟,如以禅喻诗、以味说诗,都是如此。西方隐喻理论包含着一个毋庸置疑的理论前提:隐喻首先是一种哲学行为,其次才是语言行为和诗学行为。^{[6]112}语言研究的范围极其广泛,西方最初的隐喻的研究与语源学的联系最为密切,他们是站在对语言进行哲学分析的立场上,透过语源学关注隐喻。^{[7]103}在古希腊人看来,有些词语是原创性的,有些词语是通假性、派生性的,是从别处租借、移用、延伸过来的,它们的背后掩藏着一个“真实”的初始意义,语源学的使命之一就是挖掘这个“真实”的最初意义,探究语言的发展历史。隐喻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它们可以相互转化:语言是隐喻产生的基础,而隐喻是新的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例如,人类经过“体验”而创造出的概念、范畴反过来又作为新的现实(人造现实)为人类提供了新的“体验”材料和隐喻认知对象。如说某人“内存不够,硬盘太小,286的档次”来形容其人记

记忆力低下、反应迟钝,这个“计算机隐喻”就是典型一例。计算机纯粹是人类思维的隐喻产物,属于人造自然,“内存”、“硬盘”等等可以说是“语言促使人类投射出的现实世界”,反过来它们又可以作为“客观存在”来指导、建构对人类思维的体验——认知工作,即运用“建构与语言状况相符的阐释来使现实适应话语”。这样,思维与现实便构成了互动转换关系。而在中国文化中,“隐”意味着含而不露,意味着超乎象外、词外、言外、文外的多重意义,而这正是文学的价值和诗人的追求所在。隐含是隐喻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其主要功能——启发的具体体现,它拥有一种明喻缺少的意境,就像中国的山水画,含而不露,更能诱人深入领会,这就是隐喻语言艺术的魅力所在。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必然要借景抒情,托物达志。“流波恋旧浦,行云思故乡”(张协《杂诗》)、“人情怀旧乡,客鸟思故林”(王赞《杂诗》)、“思归如汾水,无日不悠悠”(李白《太原早秋》)、“月色不可扫,客愁不可道”(李白《拟古其八》)、“归梦如春水,悠悠绕故乡”(刘昫《全唐诗》)、“长路未归萍逐水”(吴融《丛祠》),这些诗句抒发简单的思乡之情,却产生了含蓄丰富的多重意义,不仅表达了本“不可道”的“客愁”,而且耐人寻味,这是因为它们借用了适当的物象:留恋旧浦的流波,思念故乡的行云,不可清扫的银色月光,脉脉含情的春水以及春水上的飘萍……这些恰当的物象都是恰当的“喻体”,它们与它们实现的功能“隐”结合在一起,形成东方式的“隐喻”,从而也丰富了隐喻的内涵。在西方,隐喻主要是一种行为。在中国,隐喻不仅是某种行为,它还孕育和包含着中国文化表达策略的最高原则“隐”和基本手段“喻”,也派生出中国文学意义的生成原则和生成方式。^{[8]115}

由于地域的、历史传统的以及各自文化形态的差异,人类才有了不同民族和社会的具体存在,隐喻思维在不同的民族中也包含着不同的文化内涵。用卡西尔的话说,“天人合一”是中国的根本隐喻(root metaphor)。^{[9]48}从最宽泛和最本质的意义上讲,人有喜怒哀乐,物有悲欢离合,显然,“天人合一”观念就是人类把自己的有限的认识投射于宇宙万物,因此自然的“天”被赋予了肯定性的价值和意义,它也有人的道德甚至丰富的情感。早晨看到植物上的露珠,便以为那是星星告别地球时洒下的依依不舍的泪水;看到枯枝上发出一枝嫩芽,便马上想到生命的执着……人与天可以相向欢乐不已,也可以同病相怜、感慨唏嘘;感时花也溅泪,乐时天亦开颜。孤雁南飞,暗示着人间的别离生死,猛虎的蓦然回首,象征着勇士的凛然气概……人间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都可以从自然万物中寻求到感性的印证,人们用无限的宇宙万物印证自己有限的活动、语言、价值、观念、情感、意义,而且在长期的观察和反复不已的经验概括的基础上,人世的方方面面渐渐与自然万物不同种类之间的关系也趋于固定化、普遍化、复杂化、细致化了,这样天人合一的观念又演化出了种种人物的文化交感细则,万物的四季交替,凡人的生老病死。在中国哲学史上,孟子哲学体系的基本命题是“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上》);老子哲学体系的基本命题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0]77},于是“道”统一“天”、“地”、“人”,“道”构成了人类的终极理性和终极真理。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基本命题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而其中“天人合一”又是最基本的命题,其意义在于要求解决“人”与“整个宇宙”的关系。^{[11]185}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哲

学思想把世界看成是天人统一的整体,因而孕育了中华文明的精髓——和合文化(harmony with diversities)与之相对的西方文化则强调“人”一旦从“自然”之中被生成出来,“人”即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存在,这种独立性正是通过人将自然作为自身的对象物的过程而显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共处,彼此互为观照,唯其如此,才有了彼此之间的对立和统一。^{[12]169}“隐喻思维”是人类一种基本的认知模式、思维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存方式。

三、隐喻的文化语境

语用学研究的是话语行为的意义,而隐喻的语用意义不是独立于交际语境之外的句子意义,而是要依赖于特定的社会 and 历史文化语境(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dependent),脱离了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隐喻就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和阐释。我们知道所有的隐喻都是从一种所指意义中抽象出来,并把抽象出来的特点映射到另一种所指意义上去。^{[13]152}比如说,人们会采取同一个喻体去映射本体,不管是英语、汉语还是法语。由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所以势必造就了一些差异性。我们说的“近取诸身”只是一般的取喻规律,创造比喻的人还会因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家庭背景和文化层次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甚至也会因为心境的改变而有所不同。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作为传统深深扎根于一个民族的经验 and 思想之中,生活环境、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直接影响着喻体的选择和使用。例如,中国盛产竹子,我们常用竹子来比喻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英国是一个岛屿国,四周环海,因此英语中有大量与航海和捕鱼有关的比喻和习语。例如“未雨绸缪”英语的表达是“to cast an anchor to windward”,“抓到篮子便是

菜”译成英语是“All is fish that comes to one's net”。在汉语里有很多表示“吃”的隐喻,而且是有中国特色的“吃”的隐喻。如“在这个赛季的比赛中,他已经吃了三张黄牌了。”“路途遥远,一路上他们吃尽了苦头。”“这次单位分房,他可吃了个大亏啊。”“他现在就靠吃老本。”等等,这些比喻都是用“吃”来映射“得到”,这与中国特殊的地理文化环境有关。自古以来,中华文明是一种传统的农业文明,农业一直是国家经济的命脉,人们的生产以及经济活动主要是依附在土地上,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吃”或者说饮食问题成了中国人生活的重心。所以在这个具有浓厚的“饮食文化”氛围的社会中,人们的思维和表达思维的方式都具有鲜明的“吃”的特色。事实上,由于受到这个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人在许多领域的活动都已经被饮食隐喻化了,“吃什么东西”和“怎么吃”成了人们借以认知世界、表达思维的工具,因此,“吃”丰富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同时也丰富了语言。^{[14] 224-225}

四、中国隐喻中的“比和兴”

大体上讲,中国古典诗学较为关注隐喻(如所谓的“比兴”)的诗教或政教作用,所谓“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礼记·学记》),因此隐喻更多的是一种伦理教化手段。在更多情况下,隐喻作为政治修辞术是以微辞曲笔(“春秋笔法”或“显白书写”)的面目出现。从隐喻理论的角度看,“比”和“兴”既可以具有隐喻的形态也可以具有转喻的形态,既可以具有隐喻的功能也可以具有转喻的功能。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功能上,它都不限于某种固定的形式。“兴”的功能在于创造崭新、丰富的意义,而创造意义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产生怎样的意义取决于物与情之间

处于怎样的逻辑关系和现实关系之中。朱光潜认为,“隐”只是一种态度,一个过程,“隐”的结果才是艺术的技巧。所隐者有时偏于意象,所引事物与所咏事物有类似处,这就是“比”;有时偏重情趣,所引事物与所咏事物在情趣上有暗合默契处,可以由所引事物引起所咏事物的情趣,这就是“兴”。^{[12]135}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隐喻都出自比拟,比拟可分为拟人和拟物两种。拟人是以人体、生命为喻体的隐喻,是生命化的隐喻;拟物是以事物为喻体说明和阐释有生命的事物。“一壶酒,一竿身,蓼上知依有几人?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赵翼《野步》)秋风管闲事,云彩能发愁,皆因它们都像人。拟人是神话式的想象,它把人格力量投射到外部事物之上,赋予自然界以生命和灵魂;拟物与此截然相反,它通常消解认定主观意识和生命意识,是“物化”人类,“消解”人性的自觉行动。

“兴”不是纯粹的雅克布森意义上的转喻(转喻的本质是语言的组合功能的发挥,其中一个语素与另一个语素通过某种规则组合在一起),它还具有隐喻的功能。^{[15]118}这时,决定组合因素的组合方式的是时代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范式,而这恰恰是神话魅力的根本之所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16]1}前面两个“兴”句与后两句恰成对照,无论是从语言还是从语义的角度上都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我们可以单纯地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看作是并无深沉语意的一般环境描述,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理由认定鸟类世界的生活与人类世界的生活有着某种对比的、对照的或相似的关系,鸟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关系模型是存在的。在这里,重要的不是鸟的种类而是鸟的行为:是单飞还是双栖。孤鸟单飞暗示人类生活的挫折和困顿(如《孔雀东南飞》),双鸟栖息暗示人类

生活的和谐美满(如《关雎》),这种联想模式是在经验事实的研究中发现的,但也能说明不同鸟类行为所隐藏的神话含义。鸟类行为对人类的重要性在于,季节的变化在人类日常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候鸟飞行与神圣的生命节奏恰恰是互相参证的,在这个过程中,生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鸟类在迁移的过程中交配,也许正是由于如此,鸟类常常被当作宇宙系统中婚姻和谐美满的隐喻。这时人们对“兴”的阐释建立在自己的文化知识、文化感受力和对文学惯例的领悟之上,而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文化阐释。

作为一种隐喻,“比”可以创造具体而直接的意义,除此之外,它还具有两个西方意义上所不具有的特征。第一,“比”把人类的内心世界与认识的对象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天人合一、主客混同的精神状态,靠体悟和直觉去认识世界,用心悟道;第二,在高度精炼化的律诗中,对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偶能够在语义上使分处对应位置的隐喻相互暗示、指涉和阐释,这必然大大降低隐喻的含混性、暧昧性、歧义性和不可理解性,读者可以理解它们的组合效果而不是选择的效果。这也体现出国人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特有的“双重思维”的心理定势,是中国哲学中所特有的“二元思维”心理定势和认识论方法在艺术中的表现。^{[8]147-148}因此可以说,“比”和“兴”的隐喻操作远比我们以前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表现为历史阐释的丰富性和歧义性,同时又来源于我们的文化传统——隐喻思维之中。

五、结语

隐喻思维是人类共有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特点,作为认识世界和阐述世界的方式,隐喻存在着一定的共性。由于地域的、历史传统的以及

各自文化形态的差异,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作为传统深深扎根于一个民族的经验 and 思想之中。我国历代的文学精品中充满了精彩的隐喻,中国诗学中最具特色的写作手法是“赋、比、兴”。隐喻同自然和人类一样,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不断孕育新的生命。通过对中西方隐喻这一特殊的语言认知特点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发现隐喻的建构机制和使用特点及其深层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杨元刚. 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78.

[2]张沛. 隐喻的生命[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

[3]吴越民. 文化话语视角下的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177.

[4]Lakoff &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1.

[5]Bipin Indurkha. *Metaphor and Cognition*[M].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2:288.

[6]G. Lakoff and M. Turner.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112.

[7]Andreas Musolf and Jorg Zinken. *Metaphor and Discourse* [M].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9:103.

[8]季广茂. 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15,147-148.

[9]Martin J. Gannon. *Cultural Metaphors*[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2001:48.

[10]老子. 道德经[M]. 陈默,译,注. 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15:77.

[11]丁建新,廖益清. 批评视野中的语言研究[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185.

[12]贺昌盛. 象征:符号与隐喻——汉语象征诗学的基本型构[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9,135.

[13]Zoltan Kovecses. *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2006:152.

[14]彭增安. 隐喻研究的新视角[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224-225.

[15]Marcel Danesi. *Messages, Signs and Meanings*[M]. Toronto: Canadian Scholars' Press Inc,2004:118.

[16]孔子. 诗经[M]. 黎波,译,注. 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15:1.

[17]吕剑兰,谭晓丽,郎勇. 安乐哲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读者接受研究[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18-121.

[18]赵联斌. 新闻翻译的“适合”和“忠实”[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22-126.

[责任编辑]王立国

Research on Metaphor from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WU Yue-m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China)

Abstract:Metaphorical thinking is the thinking mode and feature shared by humankind. The diversity of regions,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cultural forms results in the specific existence of different nations and societies. In different nations metaphoric thinking embodies different cultural connotations. Living environments, values and religious beliefs directly influence the choice and use of vehicles. According to the Western metaphor theory, metaphor is in the first place a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then the linguistic matter as well as poetic imagin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culture, the concept of "oneness of human being and nature" in *The Book of Changes* is the cultural basis of Chinese metaphorical thinking. We can comprehensively discover the structure and application of metaphor as well as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by doing research on the special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featur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taphor from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Keywords:metaphorical thinking; research on metaphor;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